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

○○○○○○○○○○○○○○○○○○○○ 商逾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 及其历史命运

商 逾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及其历史命运/商逾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8(2004. 3 重印)
ISBN 7 - 5607 - 2609 - 7

I. 马…

II. 商…

III. 马克思著作研究—史学理论

IV. A811. 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380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73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401—24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导 言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沿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当代西方哲学论坛、自然科学哲学论坛以及社会实践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透视其原因，有着广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底蕴。

20 世纪初，随着古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成为自然科学哲学论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量子力学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基本标志。量子力学的产生，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的机械决定论，为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提供了契机。量子力学雄辩地证明，“如果提供给我们对于过去事件的充分精确的描述以及一切自然法则，任何事件都能够以任何期望的精确程度通过推理预测出来”^①的机械决定论已经陈腐了，基本粒子的运动不再具有经典力学规律那种严格的确定性和精确性，量子力学规律描述的是单个粒子运动的统计平均，而不是它在某一确定时刻在空间的精确位置，几率或随机性概念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现代科学另一重要的成果是分子生物

^① [英]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学，它揭示了生物变异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说明偶然性和随机性不是事物可有可无的属性，它们源自事物的本性，这给予否定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以有力的反击。系统科学是现代科学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它对系统非线性的、多值的因果关系的揭示，使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变得丰富起来，线性的、单值的因果观不再具有生存的空间。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使人们对贯穿于自然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机械决定论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也由于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事物、现象和过程存在发展的偶然性、随机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特征还未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地显露出来，这就使得恩格斯创立的原则上正确的唯物主义自然决定论，面对西方非决定论哲学的挑战，缺乏应有的具体性和针对性，非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论坛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派别。

人类社会历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也是不同哲学派别的必争之地。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挑战和歪曲。在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一些大学教授和青年派，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庸俗化、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完全是自动形成的，它丝毫没有人的参与，经济必然性就像玩弄棋子一样玩弄人。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也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真谛，在考茨基等人看来，经济必然性如同自然规律一样必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论本性的严重歪曲。长期以来，这种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简单化、庸俗化理解和运用的倾向，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西方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在

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关系中，始终坚持前者的绝对统治地位，即强调历史客体、绝对必然性和单线决定的因果性主宰人类历史的命运，忽视或否定人的观念、意志和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实质上，当他们这样理解时，就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看成压制个人自由意志的机械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罗素认为，马克思对经济优先地位的强化，使得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日益变得僵化起来，他指出：“关于这种僵化，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① 他力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历史，断言：“那要比马克思的更接近于真理。”^② 西方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也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曲解为否定主体能动地位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并大加鞭挞，他写道：“马克思把历史舞台上的人间演员（包括所谓‘大’人物）都看作是受经济线路——被他们无法驾驭的历史力量——不可抗拒地推动着的木偶。”^③ 与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原则相反，他强调：“那些构成我们的知识的观念——比生产的较为复杂的物质手段更基本。试想某一天，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在一种较小的范围内，经过无数人饿死之后），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切知识都消失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的部落占据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

① [英] 罗素：《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3 页。

② [英] 罗素：《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3 页。

③ [英]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 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8 页。

形。它很快就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完全消失。”^①这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歪曲、附加和否定。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变得尤为迫切。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卡尔·波普尔在其论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提出了挑战，指责唯物史观为“宿命论的特殊形式”，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断言马克思以历史规律为依据对人类未来美好前景的伟大构想是乌托邦。今天，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学者又迅速地作出应变。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声称：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和社会主义的衰败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历史存在的根本矛盾归结为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否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和对立。在此，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问题，就成为不容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国内学术界，面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著述，推动了这一历史理论向纵深层次的发展，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缺乏深层的考查与分析，因而，在诠释和判定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内涵方面歧义丛生。不仅如此，就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内容而言，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善。比如：为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规律起作用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实现方式又如何，为什么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

^① [英]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

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更高的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绝不会出现，社会历史进程中规律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会出现不同的上层建筑体系，如何理解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关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商品经济阶段不可超越，等等。如果不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性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定会把唯物史观变成抽象的一般原则或僵死的教条，在理论研究中引发一系列混乱，最终导致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核——历史规律的怀疑和动摇，诸如认为“如果还是固守着传统唯物史观那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那就不能埋怨历史学家会逐步离开它了”^①。借口批判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否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疑抽掉了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基石。面对这种情形，只有沿着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历史演化的轨迹，如实地揭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丰富内涵，充分吸收当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本质和当代价值，澄清理论领域内的错误见解；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作用。

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冲突、东西方文化的摩擦和契合、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论坛上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非决定论思潮的泛滥，既向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给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以注重历史基本走向为底蕴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

^①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论，正确地回答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选准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坐标点，立于不败之地，回击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是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发展的，但是，它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历史演化的每一个关节点，都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不可避免地打下时代的烙印，这就要求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揭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切忌局限于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决定论思想，并将其绝对化、简单化。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如实地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演化的历史形态，则成为本书理论探索的主题。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历史探源的基础上，准确领会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内在逻辑，展示其历史理论的丰富内容和辩证本性，说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是彻底超越机械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和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唯意志论两极对立的科学的历史理论，便成为本书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

追踪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基本走势，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概括现代科学和历史哲学的最新成果，廓清笼罩在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论坛上的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非决定论的迷雾，扼制非决定论思潮的泛滥，切实解决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在现时代面临的理论难点和热点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充分显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当代价值，构成了本书追求的终极目标。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编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形态	(1)
第一章 对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倒戈”	(2)
一、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前史	(2)
二、从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向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 转变	(8)
第二章 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抽象规定	(21)
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逻辑 起点	(22)
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 根本宗旨	(30)
三、历史规律存在根据是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基石 ..	(38)
四、历史主体和客体的交互作用是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辩 证本性之所在	(42)
第三章 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具体展开	(51)

一、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辩证性和整体性原则的出发点	(53)
二、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有机体内诸要素一元决定和系统展开之关系及其历史特点	(57)
三、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关于社会有机体内诸要素一元决定和系统展开之关系的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发展	(85)
第四章 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全面升华	(107)
一、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补充和拓展	(110)
二、历史“合力论”是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制高点和结晶体	(131)
第二编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形态	(138)
第五章 历史进程受客观必然规律支配	(139)
一、历史规律寓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	(139)
二、历史规律的特点	(148)
三、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与偶然趋势的关系	(156)
第六章 历史规律是人活动的规律	(163)
一、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辩证关系	(163)
二、历史进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172)
第七章 历史规律普遍性与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关系	(180)
一、历史发展“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的关系	(180)
二、“世界历史”背景下历史规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190)
三、马克思“跨越”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196)

第三编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命运	(206)
第八章 现代科学背景下的自然决定论	(207)
一、自然决定论演化史	(207)
二、唯物主义辩证自然决定论	(216)
三、现代科学背景下自然决定论的新形态	(222)
第九章 当代西方哲学背景下的历史决定论	(240)
一、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肯定	(241)
二、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否定	(256)
第十章 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亟待发展	(279)
一、历史规律本体论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	(279)
二、历史规律认识论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	(289)
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	(297)
一、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98)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选择	(300)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选择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13)
后 记	(318)

第一编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 的历史形态

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决不是天才人物头脑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作为科学形态的历史理论，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同时它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思想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同那个时代密不可分，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特点。这就有必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丰富的理论内涵，切忌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的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思想，并把其绝对化、片面化。于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依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探讨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就成为准确地领会具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体系，展示其当代价值以及判定其历史命运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第一章 对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倒戈”

任何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所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也是如此。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史构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深远的理论基础，黑格尔唯心主义理性历史决定论和费尔巴哈人性历史决定论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直接的理论来源。在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理性历史决定论出发，以费尔巴哈人性历史决定论为中介，走向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

一、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前史^①

当人类由于物质生活的需要，开始揭示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对自身活动的规律、动力和目标的认识尚处于浓厚的神学迷雾中。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当然，并不能说在这一

^① 参见商逾《决定论的历史形态——西方决定论史研究》第14~1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充满了谬论和成见，毫无成就可言，恰恰相反，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如同历史本身的进步一样，处于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就经历了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理性历史决定论的演进过程，这一历史演进过程，构成了通向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必要一环。

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事件、现象和过程的研究远未达到哲学思维的水平，那时，还谈不上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史。古希腊哲学家笼统地把永恒不变的本原或始基，看成宇宙万物循环运动的“逻各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还不能把自然和社会区分开来，社会历史被包容于自然中，成为自然的简单延伸和扩大，丝毫没有给历史研究以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们还不能从自身的历史中概括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只能从历史之外把超自然、超历史的上帝看成人间吉凶祸福、民族兴衰荣辱、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力量。在中世纪，用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解释历史自身必然性的神学历史决定论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所有神学家都主张，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的等级秩序皆出于上帝的有意安排，除了上帝，没有偶然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人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随意摆弄的棋子。这种神学历史决定论与历史宿命论别无二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神学历史决定论很难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因为其一切推论都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中发现的。但是，同古希腊人的历史循环论相比，它仍有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奥古斯丁在《论神之都》中，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两大阵营，坚信人类历史就是两种信徒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上帝的信徒必然胜利，永恒幸福的“神之都”必将出现。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

历史冲出了循环，走向了进步。神学历史决定论突破了古希腊人狭隘封闭的历史视野，以某种“世界历史”般的宽广胸怀，把积极向上的品格赋予历史，奠定了西方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基础。

然而，确切地说，只有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才真正拉开了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序幕。

人性历史决定论决不是纯粹抽象的历史概念逻辑推理的结果，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普遍革命密切相关的。从15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掠夺东方财富，进行了海上探险活动，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冲破了民族史、区域史的狭隘界限，发现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提出并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革命，也迫切地需要用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革命，即文艺复兴运动，使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历史，人们不再从神的意志，而是从人自身中引出历史的必然性原则。这一切使历史决定论的研究重心实现了从神学历史决定论向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必然转变。

意大利17世纪思想家维科是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开创者。他反对直接用神的旨意解释历史，他在《新科学》一书中写道：“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

它。”^① 在维科看来，人完全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决定了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历史规律的依据就是“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②，即一切民族都具有的共同起源和特征。尽管历史发展在细节上充满了种种偶然的曲折和偏差，但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使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具有了大致相同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

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他那里，人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前提。那么，人是何物？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由于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把人归结为上帝的创造物，结果是，上帝的旨意成为历史的基础和实现历史目的的动力，最终未能从神学史决定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

法国启蒙学者不满足于维科用外在于历史的神意对历史规律的吞并，他们强调人类历史自身如同自然事物一样，受不变的规律支配。孟德斯鸠指出：“人，作为自然实体，是和其他物体一样，受一些不变的法支配的。”^③ 他们从社会环境，即人类自身都具有的风俗、道德，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中寻找历史“不变的规律”。问题在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人的精神风貌又渊源于何处？18世纪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孟德斯鸠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地理环境中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是一个

① [意] 维科：《新科学》（上），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4页。

② [意] 维科：《新科学》（上），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8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